

读有所得

画龙点睛 神来之笔

——谈谈长篇历史小说《天下湘军》

刘伟明

长沙作家朱容臬(笔名楚天舒)博士,经十余年呕心沥血创作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天下湘军》,终于得以面世。该小说计有240余万字,时间跨度长达80余年,是中国文坛多年来难得一见的皇皇巨著之一。

鸦片战争以后,大清帝国已呈现出大厦将倾之势,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天朝的根基更是摇摇欲坠。此时,一支由湘人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便应运而生。“湘军”当时是以民团为主要成分组成的,后来却成了一支清王朝赖以续命的“铁血之师”。

小说《天下湘军》试图以最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写作态度,写出当年湘军为国家赴命的铁血精神。该书通过湘军的故事娓娓道来,在阅读中,读者可以对晚清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的真实状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天下湘军》是部章回体小说,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学演义风格,可见朱容臬博士对于经典古籍的研究用情至深至专,才能熟练地驾驭这种体裁而古为今用。作者通过自己各种努力,博览了无数关于湘军包括民间传说稗官野史在内的各种资料,剥茧抽丝,去伪存真,不失为一部可以为史家借鉴的文学著作。

《天下湘军》是一部惊世之作,也必定会是一部传世之作。这部小说的诸多优点许多评论都已经谈过了,现在我就该部小说对于传统诗歌的创作与运用谈谈自己的看法。

众所周知,传统诗词在章回体小说中的运用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法,除却“四大名著”,其他章回体小说均无例外。运用诗词既可以为小说本身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也可以作为每一章回的压卷和承上启后的转接点,为故事情节铺垫发展的伏笔。如“三国演义”就借用了明人杨慎的一首临江仙的词作,就起到了全书开篇定场的作用。

朱容臬博士在《天下湘军》中共用了120首七绝诗作为每一章回的压卷,用了一首七律作为该著作的结尾,依我看来,这倒是一种颇为有新意的章回体小说创作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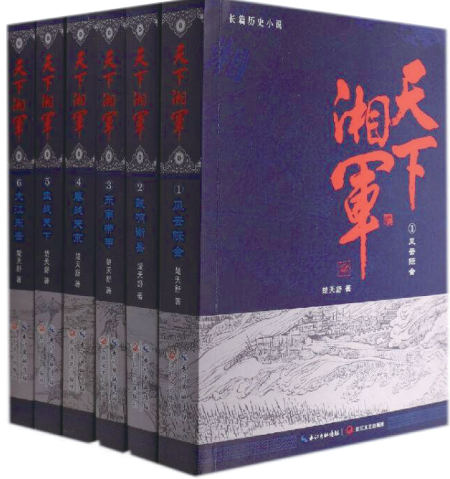
比如第一卷风云再会之第一回,朱容臬博士就用了“万物昭苏天地曙,定庵诗若若惊雷。不拘一格人才出,欲使江山再造回”这么一首绝句压卷,通过龚自珍和陶澍的出场,晚清暮气沉沉苦苦支撑的局面便被搬上了历史舞台。而第二回中的“南来一剑挂珠江,岂有天朝可屈降。荷利国家生死以,英雄从此再无双”,表现了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豪气干云的英勇和壮志未酬的悲愤。前一首诗恰恰通过压卷为全书展开了一个恢宏的历史场景,第二首诗作为压卷就为湘军故事的生发起到了

恰到好处的引领作用。这两首诗对人物性格和历史事件把握精当入微,加之化用了人物当时的原句,情绪沉郁深痛,用词慷慨激昂,读之令人唏嘘不已。

这就是诗歌在章回体小说中的妙用。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所主张的“书卷之气”,因为加持了诗歌,使原本通俗的演义顿时大气磅礴起来,使文学的意义顿时也熠熠生辉了。

《天下湘军》写了1400多位人物,上至皇帝老儿、后妃及朝中衮衮诸公,还有诸夷、起义军的各种代表,下至贩夫走卒村野翁媪,无不活灵活现呼之欲出。湘军将领中风流儒雅者大有人在,他们曾为博取功名而刻苦耕读,而当国家有难时,他们则以下天下为重,义无反顾挺身而出。这个英雄群体上马敢牺牲,下马可诗文,他们充满英雄主义的作品也为中国文化史铸就了一个民族精神特别张扬的时代。他们的作品朱容臬博士在小说中多有直接引用,对深化人物性格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朱容臬博士唯一一首引用了古人原作放在了第六卷大江东去之第一回的压卷诗是:“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裁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是湘军一位重要将领杨昌浚当时送左宗棠西征平乱收复新疆的赠别之作。朱容臬博士将此诗的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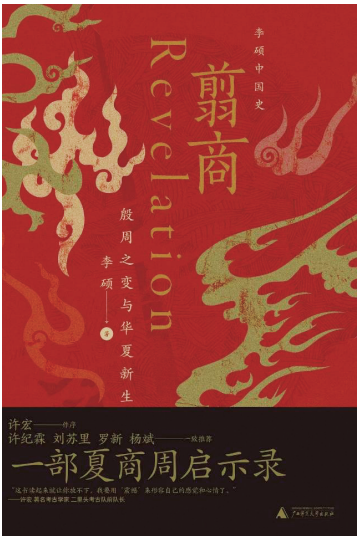


用到了极致,小说的叙事本来到此已渐入佳境,推向了高潮部分,读者通过这首诗,既可以了解左宗棠其人的豪情壮志、高风亮节,又可以进一步了解湘军在戡定内难、抵御外敌、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等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更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危亡之际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和情操气节。这样天衣无缝的借用,当然可以称之为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了。

朱容臬博士对于传统诗歌在小说中的运用是十分娴熟的,也十分恰当,显示了他良好的学术素养和文学底蕴,也为《天下湘军》增加了不少新的阅读体验。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作家能多掌握一些传统诗歌的写作技巧,使自己的作品能够闪烁出新的亮点。

(《天下湘军》,朱容臬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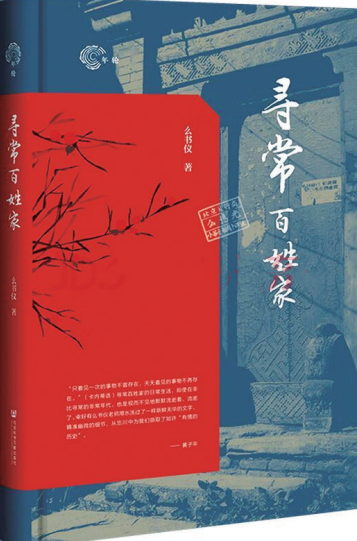
读马观书



《翦商》
李硕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一段,一位六岁的女孩去博物馆看河南青铜器展,她看到一个青铜鼎很兴奋,问父亲这是不是用来做饭的,刚刚看完《翦商》的父亲促狭地告诉女儿:“也可以用来煮人头。”

几年前,李硕《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震撼了整个读书界。以这篇文章为基础,李硕今年推出了《翦商》。这是今年最有知识增量的历史作品之一,很多原本认为不可思议的说法,都在李硕严密的考证和推理下被证实。



《寻常百姓家》
么书仪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应该写一部家史,但能写好家史,难乎其难。难就难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抉择、“情感”与“学术”之间的均衡。

《寻常百姓家》的好处即在“入”而能出,近而能远,家史的琐细亲和,背后却是近代金融史、社会组织史与日常生活的磅礴幻变。作者有着热烈抒情与绵密行文,又有着冷静克制的叙事笔调。就家史写作而言,该书可为当世之范。

悦读

我写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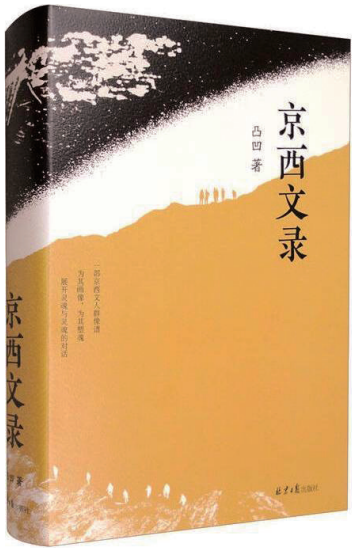
凸凹

专家们称,北京文化的不断代特征,是靠房山各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所证明的,形象地说,房山是北京文化的后花园和天然博物馆。

而房山文化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起点、原点和支点,是体量最大、价值最大的核心部分。所以说,解读了房山文化,就是解读了西山永定河文化,乃至解读了北京文化。

而一个文化带的文化构成,除了文物遗存、历史文献、民俗风物和山水人文之外,还有与文化有关的人,包括他们的实践行为、研究成果和文化著述等等。

改革开放以降,位于京西南的房山,



好书摘读

许倬云

自从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以后,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对于瘟疫的记录是一个常态。可真正大规模暴发的瘟疫,记载比较多的是在公元2世纪后半段(大约公元170年)一直到公元220年这半个世纪。这段时期的中国几乎是瘟疫不断。

东汉末年,发生瘟疫最大的地区是禹州、青州、徐州。这是当年的东汉政权——也就是三国政权所在的区域,整个中原地带的东半边。那个地带在东汉时期人口最繁密,农业非常发达,居住的环境相当拥挤。而且有个问题是常常发生水灾。这种浸水的地方,就是培养细菌最好的环境。当地因为潮湿的关系,年年都会发生疾病。

这一段时间有更重要的事情,是中国的“医圣”张仲景出现了。他是河南南阳人,家里是有两百多人的大族,瘟疫以后死了三分之二。所以他结合自己临床治病的经验研究瘟疫,写了本书叫《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是具体地、切实地从自己看病的经验,对疾病做分类、分析,并提出诊疗方案。这一段时间,中原地区死亡率是很高的。当时大概全中国人口有5000万上下,在瘟疫大规模暴发的区域大概有两三千万人口,那是人口最集中的地区。

城市里面发生瘟疫的情况跟农村那边几乎是一样严重。农村可能因为医药环境差一点,但是面对瘟疫,城市里的人也没有很有效的办法应对。比如说历史上的“建安七子”,是当时有名的七个学问家,里面有五个死于传染病,可以想象其严重

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学者、作家、艺术家,其文艺人才和文化工作者的数量之多、成果之夥、影响之大,是其他区县所不能比肩的。

事实上,他们的文化身份举足轻重:是历史文化的研究者、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当代文化的创作者和群众文化的指导者。

这些文人、学者、作家、艺术家,不仅是简单的文化载体,而且是文化的创造主体,其本身的艺术风采、创作品质、思想含量、文学价值等,毋庸置疑地成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中最生动、最鲜活、最丰富、最有生命力和最具时代特征的文化部分。

历史说,有什么样的地域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而现实说,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地域文化。这是人类进化、文明进化的辩证观点。那么可以说——解读了房山的文化人,就是解读了房山文化,进而也解读了西山永定河文化,甚至整个北京文化。

那么也可以说,这部《京西文录》,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最新的文化成果,也是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的一个有关人才成长和人才作用的经验文本。

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在场的、可资信任而且有启示借鉴意义的解读文本,我积十年之功,饱含感情地描绘了这部文化群星谱。

通过对几十位文化人物的观察、感受与描摹,给他们画像,给他们塑魂,呈现出他们在平凡中的不凡、在不凡中的平凡,在卑微中的高贵、在高贵中的卑微。

让人们通过阅读,走进他们的生命世界、精神世界,认识到文化人对社会发展的

独特贡献、对文明进化的独特作用,也从生活的角度体会到文化人的可亲、可爱、可叹、可敬。因而在心目中,给他们以神圣的位置;在现实中,给他们以真诚的尊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的这部《京西文录》,采取的是主观的视角,选取的人物大多是与我有工作交往、生活交往、文学交往、情感交往的人。

所以,与其说是选取,不如说是缘定,是自然而然走进我的心中、走到我的笔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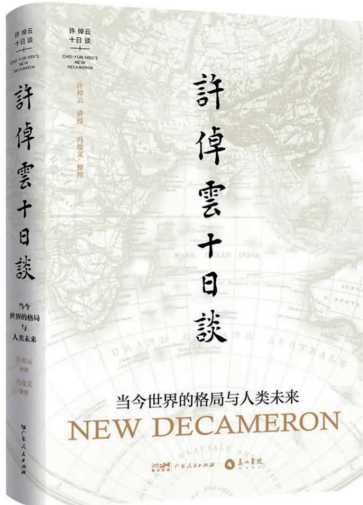
还有许多名人、大腕儿、才俊,特别是文学家之外的各类艺术家,暂时还没有写入,不是不想,实在是精力有限、笔力不逮。便请各位多多体谅,容我假以时日,再写续篇。

最后我要说的是,作为多年的房山区文联主席,我自然也是京西文人群体的一个代表性存在,但我不好自说自话,更不宜自我标榜,便只好以附录存证的方式予以呈现。

其中“凸凹著述序跋存录”呈现我的创作经历,“凸凹报刊访谈”呈现我的创作心迹,“凸凹他人评说”呈现我的创作影响。这样一来,便使我和诸位传主之间产生了一种呼应关系,浑然地“文化”在一起,并相对完整地展示出,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高原和高峰上都有人的身影和呼吸,共同构成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的当代人物谱系。

这其中,文化自省有之,文化自信有之,文化自强更有之。未来堪好,风景当殊,可以豪迈地行走到诗和远方。

(《京西文录》,凸凹 著,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疫,中国历史上还爆发过另外几次很严重的瘟疫。其中一次发生在元朝。成吉思汗从东北进攻金国,一路向西打,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强大、领土最广阔的蒙古大帝国。上都到欧洲这条路上,蒙古帝国的驿道陆续不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蒙古人的海上力量也延伸得很远,当时的阿拉伯国家和印度还有中国南部的商人都投入到海上的活动里,港口之间船只来往不断。

这些来往不断的船只、商旅,使得14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变成全球性的瘟疫,从欧洲一直影响到中国。这次黑死病影响之大,甚至使欧洲的地图都因此产生了极大的改变。瘟疫导致欧洲人力不足,逐渐形成了以机器生产来代替人力劳动的趋势。这场蒙古时代的大瘟疫,从15世纪一直延续到16世纪。

(本文摘自《许倬云十日谈: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许倬云讲授、冯俊文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里书外

叶立文

在中外文学史上,从古至今,乡愁(乡情)都是永恒的书写主题。写作者既有舞文弄墨的专业人士,也有数不胜数的平民百姓。体裁也是丰富多样,有散文、随笔,也有诗歌、小说等。他们的诉求,既是抒发自我,也是记录时代;既是留存记忆,也是寄托情怀。

也许因为研习的是历史,从事的是新闻,所以这种经历使瑞平兄有着记录的自觉。细读《洪久勘叙事》,一个“70”后的纸上村庄”书稿,我不得不为他的努力与坚持点赞。毕竟,对于求学、对于进城;对于童年、对于中年;对于时代,对于世相……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如果每个人都拿起笔,写下自己独到的观察与领悟的话,那就是往历史的硬盘里增添了一份素材,使得历史更加丰富多彩、多元充盈。

有人认为,书写乡土,追根究底是在书写一种生活,书写一个人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有个著名的观点,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也就是人与自己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瑞平先生的乡土书写,应该是在试图解决第三种关系。我们可以感觉到,出身乡村的一些人在进城过程中难免有不适,甚至是困窘。虽然忙忙碌碌,有成功亦有失败,最难受的或许是灵魂,总觉得身心无处安放,难以妥帖。而通过书写过程本身,紧张与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纾解或释放。

在本书中,作者用文字回答了个人所经历的生活,也回答了生活本身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是,他通过记录让我们知道,生存在江南湾村洪久勘的普通乡民是以什么样的方法来生活的,这也间接折射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两三代人所生活着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面貌。

尤其是,作者的写作跳出了小我的情感抒发,以超拔的眼光关注乡村里曾经有过的手艺人木匠、篾匠、铁匠、砌匠等,那些故乡生民离不了的器物如镰刀、扁担、风车、算盘……还有双抢、过年、赶墟等日常生活。

我最为欣赏的是关于乡村手艺人的“一人一世界”部分。随着时代的演进,有些手艺被淘汰,成为一个时代的背影,但毕竟是一门门活泼泼的技艺、一段段活生生的历史。这些手艺人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但是,小人物关联着大民生,他们的存在曾经不可或缺,他们的命运同样值得关注。

独具匠心的还有以器物为切口,回顾过往的乡村时光。如果器物能够开口说话,那么,它们无疑是来自生活现场、历史场景最有发言权的证人,见证过悲喜、进退,凡人的打拼以及始终不曾泯灭的人性,传承着绵延不绝的文化特质与精神内核。

当下乡村的现代化及城市化进程,赋予了乡土书写许多新的课题。评论家汪政曾经把乡村写作分为“在乡式写作”“离乡式写作”及“返乡式写作”。那么,明显处于“离乡式写作”境地的本书作者,该如何选择叙述的立场?从书中可以看出,他的笔下既有挽歌式的,也有反思性的;有一些抱憾,也有不少无奈……但在我看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不同价值观的选择。

有人认为,当下的乡土写作面临着几种困境。譬如经验表达的趋同化,以及乡土书写价值的同质性。至于如何突破这些瓶颈,当然没有标准答案,只是需要更多人的探求与尝试,不断丰富写作的主题与样态,并以鲜明的个人特色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大时代的一个小注脚”,是一个人对乡土社会及社会变迁的“管中窥豹”。

我来了,我看见,我书写。若真能如此,那么,一个人的日子应是充实而无憾的。

(本文系《洪久勘叙事》序言,有删减,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